

国企高管要“减收入”而非“降薪”

■今日视点

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掀起了一场国企高管减薪风暴: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2009年只领1元年薪,全体董事降薪90%,集团高管降薪50%,而在不久前,上海市国资委也透露,上汽集团等9家大型国有企业高层将率先带头减薪,最高降幅达到40%。

(央视2月16日报道)无论是自觉减薪,还是迫于舆论与市场压力,高管减薪总是好事,既能激励员工,增强企业凝聚力,也能为企业减亏增效。不过,目前只有部分国企高管减薪,还谈不上什么风暴。在我看来,所谓国企高管减薪风暴,理应是大幅度、高度透明和高度透明的。反观现状,则难以

让人振奋,比如,目前高管减薪的国企屈指可数,减薪的透明度也不高。

减薪风暴让人难以振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企高管减薪其实减的只是基本年薪而已,并不是实际收入,福利性收入、各种股权收益并没有减少。也就是说,国企高管减薪风暴掩盖了实际收入。从这个角度而言,降薪百分之多少的意义极其有限——降薪只是开端,减少实际收入才是大家想要的结果。我甚至以为,动不动就把降薪鼓吹成“风暴”很容易掩盖如下问题。

容易掩盖国企高管的职务消费。中国版的“限薪令”现身,有金融国企辞职者立即曝出内幕:国企高管减薪后可以利用职务消费来“堤内损失堤

外补”,一次职务消费动辄数千万元,甚至十几万、几十万元。显然,过去我们只纠缠于天价年薪,没有意识到天价职务消费。

容易掩盖奖金与福利。有的国企业绩平平,而高管的奖金、福利却与业绩不符;甚至有的国企严重亏损,而高管依然拿着高额奖金。比如,媒体就曾报道过,安徽安庆皖江发电有限公司投产当年即亏损一亿多元,而总经理彭焱却以各种名义领取数目繁多的各项奖金、福利达113万元。

容易掩盖国企高管的责任。薪酬与责任应该是紧密挂钩的,因此不排除一些国企高管以自己收入减少为由,对企业缺少责任担当。因此,公众在关注减薪风暴的同时,不应

忽视对国企高管在减薪背景下履行责任的关注,即不能让责任与薪水一同打折,不能因为减薪而让一些国企高管失去动力。

国企高管减薪风暴一定要刮,而且风力还要加大,一方面要动用政策来推动,另一方面要鼓励国企高管主动降薪。不过,国企高管减薪风暴不能只让人看到“减薪”,看不到“减收入”。更重要的是,国企高管减薪不能只是一阵风——三一集团董事长的一元年薪也是“应景之作”;而要想让国企高管收入合理化,既需要公开他们的收入账单加强监督,同时也要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不能让福利性收入、职务消费、股权收益等游离在监管之外。

(冯海宁)

“取消落户限制”有望突破城市户籍壁垒

■热点纵论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出通知,要求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就业,对企业招用非本地户籍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上学历,各地城市应取消落户限制,并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鼓励措施。

(《广州日报》2月16日)金融危机之下,大学生就业难的老问题更加明显,近日,国务院已经陆续出台了政策推动大学生就业,非直辖市取消落户限制,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其效果当是立竿见影的。

长期以来,附着着诸多权利的户籍一向是很多大城市吸引人才的重要法宝,但硬币都

有两面,大城市户籍的另一面,则是管理者排斥“闲杂人等”的森严壁垒。北京等地户籍几乎年年都被炒出天价,一方面固然说明北京等大城市对人才的巨大吸引力,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说明了北京等地户籍制度的壁垒森严呢。

大城市壁垒森严的户籍制度,已被实践证明是阻碍生产要素和人才流动的人造壁垒,长期以来,呼吁户籍制度改革的声音不绝于耳,而包括公安部在内的中央部委,也多次表态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大城市户籍壁垒,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内容。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来,户籍制度改革,却一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改革

牵涉面太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户籍制度已经成为一些大城市实现管理利益最大化的有效工具——可以吸纳人才和劳动力,却无需为落户者提供完善的公民福利。

但正如变革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乃是大势所趋一样,大城市取消户籍壁垒也是早晚的事。此次国务院要求非直辖市的大城市放开大学生就业落户限制,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非直辖市率先放开大学生的落户限制,牵涉者小,实验效果却大。如果这项政策能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不仅能够缓解大学生就业难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对整个户籍制度的改革而言,也将是一个很有效的突破口。

毫无疑问,不期而至的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困难,解决这些困难,需要莫大的智慧和勇气。但同样不可否认,金融危机也在推动着我们解决一些积压已久的老问题,比如说国企高管薪酬过高、不透明的问题,在金融危机下,国企高管限薪不仅成为了舆论共识,而且也已经落实到了政策层面。大城市户籍壁垒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下,大学生就业难的困局被放大了,大城市户籍壁垒阻碍人才流动的弊端也被放大了。老话说,万事起头难,我在想,如果非直辖市的大城市都能不折不扣地放开大学生就业落户限制,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某地户籍卖出天价,就将是一页被翻过的历史。(冬晖)

“山寨3·15晚会”是个表达问题

■公民发言

“山寨春晚”之后,一台“山寨3·15晚会”也在紧锣密鼓筹备。(2月16日《新闻晚报》)

山寨晚会与山寨商品一样都有着其草根性的特征,但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山寨产品背后是侵权问题,而山寨晚会是社会表达的问题。将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混淆,无助于我们对于社会现象进行公正的评判。山寨晚会具有社会表达的特征,这样的表达只要是公正公平的,我们即使不同意其观点,也要誓死维护其表达的权利。

其实正版的“3·15晚会”也是在表达一种社会愿望,当我们剖析央视晚会的社会性时,我们自然也就能够理解山寨晚会的社会性。从本质上讲,社会是多元的,央视有表达的权利,山寨也有着表达的权利。

坦言之,我不愿意看到“山寨3·15晚会”被舆论打入冷宫,更不希望有关部门对其进行干涉,只要其没有违法违规,它就应该和观众见面。

山寨晚会的盛行,证明了社会的真实,社会已经不再依附于政府,或者从属于个人的任性,而成为了一个自我组织的力量,寻找着自我的定位,最终服务于公民社会的进步。政府、社会和个人是三个密切联系而又不能互相代替的力量。社会应该拥有良好的自我保护能力,能够在公权力之外展现自己的力量。

从山寨商品到山寨晚会,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已经从逐利向重视社会化表述转变。我们大可不必为山寨晚会而感到惊讶,而应该感到欣喜,人们已经学会通过社会的平台来实现自己的意愿,而不能事事仰仗于公权力了。(邹云翔)

请拆迁方认真扮演好“弱者”

■公民发言

广州地铁公司总经理丁建隆大声“诉苦”,称个别“钉子户”漫天要价,动不动就挂个煤气罐跟你玩命,其实地铁公司才是弱者。(2月16日《新快报》)

地铁公司可不可以挂个煤气罐拆迁呢?我看行。任何事都必须经得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双向转换才称得上公平,“钉子户”能挂煤气罐拒拆,也得允许地铁公司挂煤气罐助拆,“钉子户”可以说“要拆我死给你看”,也得允许地铁公司说“不过我死给你看”。

拒拆就是谈不拢。别忘了,那原本是人家的东西,你想要得到就得人家愿意,总不能强要是

不是?交易讲的是公平自愿,你可以拿一块钱上商店买汽车,但得人家愿意卖给你,人家说你出这点钱打死也不卖,可你真的就动手打人,人家打不过你,于是百般无计之下在身上挂个煤气罐打劫“钉子户”:再抢我的车就死给你看!人家都不愿意到这地步了,还想咋样?

可竟然有人说,你们这些钉子户没素质,蛮不讲理,不就是身上挂煤气罐吗,我也会挂!我们只能说,热泪盈眶欢迎你们挂煤气罐来拆迁,总比拿着铁棍开着轰鸣的铲车二话不说见人就揍推倒就跑好多了,总比半夜三更打扮成“身份不明者”来偷袭文明多了,怎么能说不可以?(范大中)

■讽骨余韵

山寨足球救不了命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如此的话语用在中国足球(尤其是中国男足)的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近日,中国男足就接到“战书”,只是下“战书”的并非哪支国家队,而是一支号称要打败他们的山寨足球队。“以打败中国男足为目的,有志者都可来参加!”一个名为“山寨足球队招募令”的帖子,正在各大体育网络论坛上热传。

如此的召集令发出后,报名参加山寨足球队竟然已经超过了300人。看来中国的足

球人口,并不是如统计中的那样。毕竟,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中国男足再烂,再不是个东西,那也是从全国13亿人里面挑选出来的。想必这报名参加山寨足球队的300多人,都认为自己有着一马当先或者贝克汉姆的脚法,都有着身怀绝技而报国无门的冲天怨气。于是,在有人竖起了“以打败中国男足为目的”的招兵旗后,才踊跃地做起了吃粮人。

当然了,谁也不知道江湖的水到底有多深。假如这300多人中真的有30个如同周星

驰的电影《少林足球》中的那样,不,只要有11个就够了,中国男足还真不是这个山寨足球队对手的对手。倘若这样的话,我们倒真得要额手称庆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给这个山寨足球队授旗,让他们代表中国横扫世界。什么韩国、日本、一边玩去,我们要找就找巴西、德国、意大利——“小子,拿命来!!!”

可惜的是,这一切都是意淫。山寨足球革不了中国足球的命,同样的,山寨足球也救不了中国足球的命。山寨足球向中国男足下的战书,只是更

高版本的一种恶搞。而这一切,都源于中国男足的疲软,源于中国男足在一系列国际比赛中的屡战屡败。

好在中国男足“知耻而不勇”,面对着山寨足球的恶搞,还能保持着矜持的态势,断不会跳下场子演绎出“国际笑话”。有句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按现在的情形来看,将中国男足“打翻在地”的是外国球队,而“再踏上一只脚”的却是中国的球迷。想想,都是一种悲哀的事情。

李成仁

■就事论世

有谁向钱学森要分

中国政法大学郭世佑教授日前在校园网上发表公开信,批评部分学生的要分现象,说他作为《中华文明通论》课程负责人,连续接到07级部分同学的电话、短信与电子邮件,共计多达200-300人次,超过他调入法大5年来学生提问次数之和。

可以肯定地说,要分现象在各地大学中早已十分普遍。某大学一名教师曾给我看过学生发给他的短信,该生因“要分未遂”而在短信中对他破口大骂。这位老师无奈地摇摇头,说:“竟然有这样的学生!”因此,我十分同意郭世佑教授对学生要分现象的评价:比考分更重要的,是大学生的伦理与文明程度;比奖学金、保研、出国更重要的,是大学生的人格与品格。

然而,如果我们将对“要分现象”的评判聚焦在大学生们的荒唐无知与品行缺失上时,无疑又是十分偏颇的。不错,学生要分基本上都是强词夺理,功利性很强,手段绝非正当,也凸现了大学生思想品德上的瑕疵,因此,必须予以旗帜鲜明的抨击和制止。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学生伸手要分,甚至还有越来越普遍的趋势呢?我想这绝非说明当今大学生的思想品德的整体性滑坡,而要从事管理的现实中去寻找答案。

大学显然不能要求入读学生都是道德品行方面的完美无瑕者,否则大学也就

失去了其存在的主要价值。大学的责任除了传授知识,更在于用自身的学术精神与品格示范对如同璞玉的大学生进行灵魂锻造。因此,大学本身首先应该坚守自己的学术规范与道德底线。具体到学生学业这个问题,大学理应拥有并坚持自己的一套评价与考核制度,这个制度应该是刚性的,人人平等的,不能撼动的。大学的管理者,以及制度的执行者——广大教师,心中必须只有这把尺子,而没有任何自由裁量权。

然而,事实上,不少高校在实践中自毁制度长城,为了让学生“合格”地拿到毕业证书,为了避免因大面积的学生不及格而影响学校声誉,而放松了对学生的学业管理,让原本应该刚性的制度变得形同虚设。我想,这才是大学生要分现象越来越普遍的根本原因。

钱学森先生当年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教时,曾出了两道题,让1958级力学系学生整整考了一天,考试成绩出来后,竟有95%的同学不及格。对此,钱先生很不满意,但是,他不是简单用加分的办法送学生过关,而是让那些学生在校多留了半年时间,讲授《工程中的教学方法》,还让学生恶补高等数学。

我想,在钱学森先生面前,不可能出现伸手要分的学生,因为他的心中只有一把尺子——让学生获得真才实学。

卢荻秋

■娱者千虑

咸猪手的风情

牛年伊始,裁员212人、处处节衣缩食的香港无线台(TVB),就纱窗擦屁股——露了一手!非主流演员范琼丹(石榴姐)大爆有“咸猪手”借故非礼女艺人,马上引起轩然大波,媒体的娱眼都从央视春晚的审美疲劳中挣扎出来,盯住了那只神秘、刺激的咸猪手,老百姓也闲来无事竞猜一下谁是色魔真身,半年的娱乐大史记上新鲜地踏上了TVB的商标,还飘着咸湿的风情。

“咸猪手”在德国是一道名菜,然而每当香港旅行团到此,导游向他们推荐这道菜时,港人都会发出一阵阵暧昧的笑声,原因就是它另有深意。可见咸猪手事件并非TVB原创,只不过迄今为止被TVB演绎得最好,

首先,这事有冤情无苦主,只能引发议论纷纷。尽管TVB高层高呼声打,但并无女星报案。大家都在谴责却不知在谴责谁,或许这也是一种潜规则。

其次,咸猪手到底是多大的事儿?在若干年前或许我们还会觉得这手太重了,但经过张钰等人的内部挖潜,人们已对娱乐这个圈见怪不怪了。TVB高层如此大张旗鼓地张罗着,恐怕早已深谙炒作其道。最后,如何判定咸猪手?故意非礼女人的男人应该遭到谴责,但是这种事发生在演戏的演员当里,有时男演员演的就是这样的人,你说怎么办?假了导演不干,真了女演员不让,这一手还真难掌握,再加上很多意外触碰,更是让咸猪手姿态万千,很难一概而论。

在TVB这次咸猪手事件中,TVB女艺人和男艺人纷纷粉墨登场,每人都能亮相说两句,而媒体也会很配合地全程报道,这事对TVB来说太合算了。都说TVB的人一年到头演戏,分不出戏里戏外,经过这演咸猪手的风情,才发现会演戏的不只是演员!白波

■史有前例

房子快跑

当年柳宗元下放永州,去山春晃晃瞎逛,看中了一块地皮,想买下来,问原主多少钱能卖。原主说:“这块地偏僻得很,一直没人出价,您想要,掏四百文就行了。”柳宗元很高兴,当即成交。再后来,柳宗元写《永州八记》,专门提到这件事,还发了一些感慨。他说:那完好的一块地,要是放到长安,肯定很多人争着买,买者们你一千我一万往上加价,打破头也未必抢得到。可是在这深山老林,谁见它谁摇头。

现在,一线城市地价虽然下挫,每平方米仍能拍到两千元以上;而在我居住的这个小县城,最繁华地段也不过只有三百元一平方米。如果土地拥有思想的话,那么我这里的土地肯定会抱怨自己生错了地方,并对大城市的土地充满羡慕。不仅土地,房子也是如此。土地和房子发发牢骚倒无所谓,关键是它们的主人也会发牢骚。例如大城市郊区的农民

和西部小城镇的农民,他们的拆迁费也是不同的,这不公平。

如果公平的含义就是指发展机会均等的话,那么上述现象实在是极大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又是经济发展和城市规划等不可抗因素造成的,凭借个人的力量无法扭转。所以要想取得公平,只能靠税收来调节。

柳宗元的时代没有增值税和所得税,但是有“折亩”的做法,就是在征税的时候,把区位不好、价格不高的一亩土地折成半亩,把区位绝佳、价格暴涨的一亩土地折成两亩,这样一来,位于山春晃晃的不动产可以少缴税,位于闹市区的不动产必须多缴税。

但是仔细计算就会发现,不管是过去的“折亩”,还是现在的多个税种与累进税率,都不能让不公平完全消除。除非不动产自身可以移动:哪里价格最高,补偿款最多,它们就向哪里迁徙。李开周